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史的一元论

〔俄〕蒲列哈诺夫（Л.П.Тихонов）著 吴念慈 重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二辑）

史的一元论

[俄]蒲列哈诺夫(Л.Б.Пуханов)著 吴念慈 重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的一元论/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808-0

I. ①史… II. ①李… III. ①哲学史—研究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74号

史的一元论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31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08-0/B.184

定价: 142.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

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

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

续 1930 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 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

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

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俄」蒲列哈諾夫（Л. Б. Пухачев）著 吳念慈 重譯

史的一元論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原著第三版序文

我在第三版裏不過訂正了混進第一版的誤筆和誤排。因為我底著書是論戰上底產物這個單純的理由，所以我想改變自己底諸論據上一些地方，是不正當的。改變論爭上底著述底內容中一些地方是意味著自己方面用着新的武器來和論敵戰鬥，而使論敵用着舊的武器應戰的。一般上這種態度是難容許的，而且到了今日尤其如此。爲什麼呢，因為我底主要的論敵英·卡·密海羅夫斯基氏已物故了的緣故。

對於我們底見解的批評家們斷定如下：第一。

我們底見解其自身是不正確的。第二，在經濟的領域，我們底見解適用於俄羅斯——那是人們覺得是在其運命上走向自己獨有的道路的——底場合，尤其是謬誤的。第三，因為我們底見解使其信奉者無爲不動即給與趨向“魁卡主義”的素因，所以是壞的。今日恐怕沒有誰還敢反覆着這第三個非難吧。第二個非難，依着最近十年間俄羅斯底經濟生活之全發展行程，也被打破於萬人底眼前了。關於第一種非難，只要知道最近底人類學上底文獻，就可充分地懂得我們對於歷史的說明之正確。關於“原始文化”的真摯的著述，在以“野蠻”民族底社會的及精神的生活現象之因果關係爲問題的場合，無論何時，誰也必不能不用我們底方法。我舉風·鄧·斯泰因底古典的著述“*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來做一例。

但是，不消說我現在不能論及這個題目。

對於批評我的批評家某某，我在附錄論文“幾句向我們底反對論者的說話”中答覆着。我用匿名發表了這篇論文，所以我雖然把自己底著書作爲他人底著書叙述着，但是這個他人底意見還是我

底意見。但是，這篇論文，對於克德林氏沒有加以什麼反駁。克氏是在這篇論文發表之後，始在“魯斯可愛·保額特保”雜誌上反對我的。所以我這裏關於克德林氏要說幾句話。

能够成爲克德林氏對於史的唯物論之最重要的反對論據，就是氏所指摘的下面底事實。即：有同一宗教——例如佛教——屢爲立於非常相異的經濟的發展階段的諸民族所信仰。但是，這一論據，不過只是初見很像有根據的吧了。在這樣的場合，可依着發見“同一底宗教”應於信仰着牠的民族底經濟的發展階段而本質地變革其自己底內容的事來證明。

關於下面一點，我還要答覆克德林氏。克氏在布爾達克底希臘語原文底翻譯發見了我有誤譯的事。（請看169頁底註）而且關於這種誤譯給與若干很謹的非難。但是，實則這種誤譯底張本人並不是我。因爲這書發刊底當時，我是在旅行中，把原稿寄到彼得堡去，在這原稿之中沒有布爾達克底引用文，不過指示着應當引用底章節吧了。和我書底出版有關係的人中底一個——而且在和博學的克

德林氏所學過的古典文學學校差不多同樣的學校
卒業的一個——把我所指示的章節翻譯了。而且
如克德林氏所指摘的一樣誤譯了。自然，這是遺憾
的事。但是，這種誤譯不能不說是我們底反對論者
能夠證明吾們有罪過的唯一底失策。在反對論者
也是必要獲得些道德的滿足的。所以，我是從“人
道”上，進而喜歡這種失策者。

英·伯利特夫

(蒲列哈諾夫底筆名)

編輯者序文

編入于蒲列哈諾夫底著作第七卷和第八卷之中的他底諸勞作，成爲一個部類。這些勞作，都是貢獻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擁護和給與基礎的。

蒲列哈諾夫，到這時止，在“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智賀密羅夫底悲哀”及奢爾內色夫斯基的諸論文，還是踟躕于這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等底領域，而漫然地逍遙着的，現在拋棄了這個而移到馬克思主義底根本的諸問題底體系的研究來了。如果他到現在止，在其主要的諸勞作，不知馬

克思，昂格思底方法這種探求真理，研究現實底新武器底特性，而示這種方法底利用之很偉大的模範，那麼，他現在就是努力于把馬克思，昂格思底方法告知于其讀者，即依着“凶年”底經驗被告訴了實踐的人民主義底破產的俄羅斯青年社會民主主義者了。他欲以新的馬克斯主義世界觀來代替舊的人民派世界觀了。他欲以新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舊的人民派世界觀對立了。

如果特別用這種目的去看蒲列哈諾夫所翻譯的昂格思底小冊子“費爾巴哈論”底序文，便明白他在企圖着把這種工作運到什麼方向去。當時只間接地知道馬克思，昂格思對於鮑埃爾兄弟底論戰，及藉再錄于“Neue Zeit”的斷片文章而知道的他，就着手于昂格斯底著書及“神聖家族”底斷章文中所舉的文獻之研究了。他很早就知道黑格爾。而且當黑格爾底六十年忌辰，他把其所得的某種結論在為“Neue Zeit”執筆的論文中論列了。（“Neue Zeit”1891年，俄文的，是在論文集“我們底批評家底批評”中纔發表的。）如今，他是着手着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者及王政復古時代底歷史家底

研究。同時繼續着關於德意志哲學史及社會制度史的工作了。

這時候，蒲列哈諾夫對於“俄羅斯社會學派”有反對底計劃，已可窺見。他在俄譯“費爾巴哈論”底第四註中寫着下面幾句話：“鮑埃爾兄弟底抽象的急進主義，在許多點上，使我們想起俄羅斯底“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即俄羅斯底“社會學上的主觀的方法”也同樣地不斷地抬出“批判”“批判精神”（在俄羅斯被稱為“批判的思想”）來，但不能洞察發生于社會的諸關係自體底內部而決定着“人類底自己意識”的 Critical Process（批判的過程）”這兩者底相似，因為在他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所以他欲在特別底著述之中使牠展開。“把一方愛德嘉·鮑埃爾（“Der Streit der Kritik” Viertes Kapitel）反對黑格爾而引用的論據，與他方密海羅夫斯基反對斯賓塞而持出的反駁論之間底相似，導入于特別底論文之中，是很有興味的事，而且是得益很多的事吧。這樣的相似，表示着有名的主觀的方法之中新的東西是多麼鮮少，並且還表示着俄羅斯底主觀的社會學者們所有的一切獨創性，